

关注人民币汇率走向、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银行系政协委员热议两大金融热点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昨日,多家来自银行系统的政协委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人民币汇率和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于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此前可能被误导了,其实人民币该不该升值、怎么升值主要是与国内经济状况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立场会导致很多不同的观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测算的所谓人民币均衡汇率实际上应该与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等诸多因素有关,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有分析指出,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可能出现明显下降,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是主要原因之一。李若谷表示,今年贸易顺差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因为汇率上升了很多,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会被削弱,再加上今年的全球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特别是中东政局不稳,油价、金价都在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也推动全球通货膨胀。”

李若谷表示,贸易顺差的产生原因是很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口国也是原因之一,不仅仅是出口国的问题。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就不仅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海外需求、经济复苏、地区动荡都会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

除了人民币汇率及其相伴的贸易问题,不少来自银行系统的政协委员今年还十分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表示,针对十二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要求,银行的信贷结构也会不断调整,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就要增加。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也告诉记者:“民生银行今年的新增贷款将和去年差不多,但民生银行将致力于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放贷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此前可能被误导了,其实人民币该不该升值、怎么升值主要是与国内经济状况有关。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表示,针对十二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要求,银行的信贷结构也会不断调整,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就要增加。



图为工行行长杨凯生 春雨/摄

据了解,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贷款大约为2万亿元左右,占整个中小企业融资总额的95%,可见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之单一。同时,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的资本质量、流动性指标、杠杆率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银行需要对中小企业实施初级内部评级法,初级法对中小企业担保的要求不利于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因为它对担保人的要求较高。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我们希望能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多想一些办法支持中小企业,比如发行小企业的集合债、集合票据,鼓励商业银行深度参与中小企业债券的发行。同时,如果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增强,能够按照高级内部评级法,中小企业贷款就更方便一些。”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

允许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是大势所趋



谢卫观点摘录

允许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体现了一种民生和权利的回归。

公募和私募的优势可以并存,并不存在谁挤掉谁的问题。

私募发展没准会带来公募基金的第二春!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日前,新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放开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消息经证券时报率先独家报道后,引起了全行业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表示,允许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是向民生和权利的回归,是基金业新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老鼠仓”等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事件的发生概率。

允许炒股是向民生和权利回归

对于新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放开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谢卫深表赞同,“我支持并非因为我是基金行业的一员,只代表这个行业说话,而是因为允许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体现了一种民生和权利的回归。”在谢卫看来,监管层当初禁止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维护持有人的利益,这是由当时的大环境决定的,客观上这一禁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A股市场所处大环境的发展和投资者观念的变化,放开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已经是大势所趋,也体现了基金行业的一种进步。

我们要打击的是基金从业人员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进行内部交易、恶意哄抬股价的行为,而且对基金从业人员炒股的限制应该在《证券法》的范围之内进行,而不是剥夺基金从业人员进行投资的权利。”谢卫表示,在银行实际利率为负和通胀预期强烈的背景下,基金从业人员也面临着个人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进入基金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对投资有着浓厚的兴趣,资本市场无疑也是他们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首要选择,而且,投资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谢卫甚至认为,只要严格遵守报备制的各项规定,基金从业人员的持股期限都不应该作过多限制,比如非得要求持股期限不得低于半年等。不过,由于基金公司不同岗位的员工和

投研的关联相差度很大,比如市场营销人员就很少关注到投研,谢卫建议,不同岗位的基金从业人员报备的内容应该有所差别,直接从事投研的人员报备的内容和要求应该高于非投研岗位。

私募扶正可能带来公募第二春

长期以来,私募基金处于监管范围之外,新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将私募基金也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有公募基金人士甚至担忧私募基金纳入监管会极大地冲击公募基金的生存空间,谢卫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公募和私募的优势可以并存,并不存在谁挤掉谁的问题。”谢卫表示,只要承认大众有理财需求,为中高端理财的私募基金就有存在的理由。实际上,自私募基金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对公募基金产生了冲击,尤其是近几年来私募基金急速扩容,如今已在千亿元附近水平,乐观人士甚至认为私募基金的万亿时代四五年之内就会变为现实。不过,谢卫认为,基金仅仅是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个小部分,整个资产管理行业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私募基金纳入监管体系之后,反而会有利于公募基金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私募发展没准会带来公募基金的第二春!”谢卫认为,从整体上来说,A股市场的空间足够大,寻求保值增值的资金确实很多,私募基金的进一步发展,会激发公募基金吸收私募基金中优秀的投研体系和投资理念,做好绝对收益。同时,私募的组织形式、奖惩制度、团队建设等都会促使公募基金做出一些改进,从而加速公募基金制度变革的进程。

无论公募还是私募,谢卫都认为竞争到最后一定会呈现“二八现象”,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产品战略上,谢卫认为,公募和私募都会越来越细分

化,比如一些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地区客户的区域型基金、专门为某家银行客户服务的细分化基金。

基金公司要打造投研团队生产线

走过12年发展历程的中国基金业,日益显露出各种各样的疲态:基金业绩波动性太大、人才流失严重、基金投资和产品定位发生错位、一个基金公司的业绩表现过多地依赖于某位明星基金经理、基金发行越来越难等,凡此种种,暴露出基金业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谢卫看来,目前基金业最大的问题是投资能力的稳定性,每家基金公司都应该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团队,打造类似生产线的投研团队,摆脱过去基金公司业绩过多地依赖单个明星基金经理的格局。谢卫认为,分析一家基金公司的业绩表现时,不仅仅是一堆业绩增长或下降的数据,更要分析这家基金公司业绩好与坏背后的原因,找到基金业绩好坏背后的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最终找出一条基金公司稳定投资的路径来。

投资者在决定购买哪只基金时,过去是看人吃饭,投资者喜欢购买明星基金经理掌管的基金,而不会仔细分析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是否适合自己,厨师是谁,决定了今天吃什么菜。”谢卫诙谐地表示,如果基金经理是“中餐式”的,投资者就会选择“中餐”,而如果基金经理是“西餐式”的,投资者就会选择“西餐”,一旦基金经理换人,要么基金业绩发生明显的变化,要么投资者赎回走人。

基金业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有稳定投资的能力。”谢卫表示,基金的投资应该和产品定位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主题投资类的基金,必须是在基金公司相关领域投研人员配备到位的前提下,真正按照主题投资的要求来运作产品,而不能盲目以短期市场热点作为主题投资的噱头,甚至实际投资运作与产品定位相违背。

焦点话题

杨凯生:工行未来两年内不会有再融资计划

比如银行贷款要形成二级市场,银行的贷款应该是可以转让的,”杨凯生说,“不转让,分母越来越大,分子是不动的,银行无休止地向资本市场伸手,那肯定不是一个办法,所以这些情况一定需要通过改革进行。”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昨日在接受证券时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大型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应立足怎样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型,改变目前银行主要依靠存贷利差收入现状。

当记者问及工行的再融资需求时,杨凯生透露,工行目前资本充足率已达12%以上,未来两到三年内不会有再融资的计划,去年工行再融资的时候就曾说过,这个决定到目前没有改变。”杨凯生说,“我们既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也满足中国银监会的要求。”

杨凯生表示,银行业改革在这些年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十二五期间还会继续深化,其具体内容在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规模银行中差别很大,不同类别银行有不同的改革和任务。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上市后实现法人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及怎么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型,将是主要方向。杨凯生举例说,现在存贷利差仍然是中国大型银行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结构是不尽合理的;再有,到目前为止国内企业融资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在这种模式下,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育还

不是很成熟,实体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相当一部分来源于银行。当面临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不断改革,资本约束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情况时,银行怎么能够既满足实体经济运行对银行信贷投放的需求,又能够满足金融监管对资本充足水平达到一定标准的要求,这是需要银行深入研究的。”杨凯生说。

当记者问及这一过程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人才的问题时,杨凯生坦言,这主要是机制的问题。他说,一个重要课题是中国的银行怎么走出一条总资产规模无限扩大,但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却持续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可以保证的”的道路。比如银行贷款要形成二级市场,银行的贷款应该是可以转让的,”杨凯生说,“不转让,分母越来越大,分子是不动的,银行无休止地向资本市场伸手,那肯定不是一个办法,所以这些情况一定需要通过改革进行。”

对于前段时间招商银行实行利率市场化试点的传闻,杨凯生评论道,利率市场化不是哪一家银行实施,而是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理办法要先有一个调整,所谓利率市场化是商业银行必须根据需求、自己的融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来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显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谈及利率市场化的影响,杨凯生说,从宏观来说,实体经济要有一定承受能力,因为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银行利差小了,发放贷款少了,这一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银行,对实体经济、企业融资、公众存款、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会带来影响。利率市场化方向是明确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这个过程正在加快实现。”杨凯生说。

对于央行提出对社会融资总量考核话题,杨凯生表示,这是一种统计口径的变化,对银行实际操作影响并不大。

唐双宁:“稳健”适度从紧应成为货币政策常态

唐双宁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历史表明,松后必紧,紧后必松;小松小紧,小紧小松;大松大紧,大紧大松;我们主观能做的只是把波浪的频率降低、波幅降低。唐双宁称,通货膨胀仍然是目前的主要矛盾。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的提案。他表示,“稳健”、“适度从紧”两种模式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他说,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来看,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抵实行过四种货币政策: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

唐双宁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经验积累的过程,其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货币政策实施中也存在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些时候货币政策执行的效果还不够理想。

2008年为应对通胀,我国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在金融危机爆发

后,于当年年底又改为“适度宽松”。由于地方政府倒逼效应,近两年信贷投放新增近18万亿元。2011年,为既防通胀又保增长,我国将货币政策又调整为“稳健”。

在这期间,中央政府和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力求审时度势、松紧兼顾,而地方政府、企业和一些部门期盼越宽松越好。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同我国的干部体制、银行体制、财政体制等交织在一起。不考虑这种心理和倒逼机制,“适度宽松”之“度”难以把握。”唐双宁说。

他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历史表明,松后必紧,紧后必松;小松小紧,小紧小松;大松大紧,大紧大松;我们主观能做的只是把波浪的频率降低、波幅降低。

为此,唐双宁提出建议:“稳健”、“适度从紧”两种模式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应慎用“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除非万不得已,不可采用“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

此外,他还提出,在货币政策决策上,实行“稳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央行提出和决定;实行“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中央政府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行“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在回答“目前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到了紧缩后期”的问题时,唐双宁称,通货膨胀仍然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他说,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货币过多,当然也有一些其它因素。